

SOUTH-WE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2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INSTITUTE OF HISTORY,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P.R.CHINA**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SOUTH-WE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INSTITUTE OF HISTORY,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P.R.CHINA**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福春

封面设计：葛伟征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2）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625 字数：192 千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书号： ISBN7—5367—1560—9 定价：18.50 元
G · 250

开拓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序

何耀华^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区的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经济的日益现代化是巨变的中心，而社会文化（包括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信仰习俗、艺术与娱乐等等）的急速变迁，则是巨变在精神领域中的表现。

在文化变迁中，学习西方优秀文化已成为一种具有当今时代特色的共识。但是，对孰是西方的优秀文化的问题，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要统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答案只有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去寻找。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2 页）按照小平同志在此提出的思想和标准，判断什么是可供我们学习的西方优秀文化，那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应该怎样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我认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必须以弘扬和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若不是这样，中国文化就会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失去立足之地，更谈不上与西方文化争短长。因此，反对摒弃

^① 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西化”，过去是，今天是，永远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

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和未来文化的取向。在这个宝库中，有许许多多有益于再创中国文化辉煌和世界文化辉煌的因素。以“修身立己为本”的因素来说吧，在《礼记·儒行篇》中，曾对作为人格的理想化模式，即做一个理想化的人作出规范，提出“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推贤而进，不望其报”、“慕贤而容众”、“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先劳而后禄”、“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程功积事，推贤而进之”等等的主张，这些规范自秦汉以来久兴不衰，而且将永远为人们所推崇。诸如此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文化宝库中的蕴藏是极为丰厚的，构建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它们进行开发和新的创造的基础之上。其次是撷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使它的独特性质更加得到发扬光大。只有这样，21 世纪的中国文化才能独树一帜，才能超越西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

中国西南居住着 34 个历史悠久的兄弟民族，它们各自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宝库中大放异彩。中国西南地域辽阔，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还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地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和新的创造，包含着对各兄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各地方性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和创新。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的出版，就在于要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扮演一个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为开拓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因此，《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应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作为构建 21 世纪中国现代化文化的根本取向，并给撷取西方优秀文化以正确的导向。

目 录

开拓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

-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序 何耀华 (1)
- 元代以前云南移民概略 申 旭 (1)
- 氏、羌民族南迁云南考 段玉明 (34)
- 近代外地移民入滇概要 牛鸿宾 (56)
- 论云南古代汉族入滇概要 王懿之 (87)
- 西昌历史上的移民及其文化的更替 ... 刘 弘 (104)
- 贵州傩戏与民族迁徙
- 以晴隆苗族庆坛为例 杨 兰 (131)
- 云南省昭通地区的汉族移民与傩文化
- 王 勇 (149)
- 云南人被称为“贺”的来由 谢远章 (170)
- 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鸡街乡太平村
- 汉族冲傩戏、阳戏调查 赵大宏 (175)
- 云南蒙古族的文化形成
- 兼与北方蒙古族文化比较 李桂英 (210)
- 明清时期云南移民与冶金技术 李晓岑 (219)
- 后 记 (234)

元代以前云南移民概略

申 旭

一、秦朝以前的云南移民

“水往低处流，人也往低处走”，对于历史上早期的云南移民来说，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个总的概括。在云南早期移民史中，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对薄弱，民族或部族的迁徙大多是出于经济或战争的原因，而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在很多情况下是人口移动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自然状态下，水流的方向大体决定了移民的方向，对于那些有着“逐水草而居”习俗的民族或部族来说，尤其如此。翻检云南早期移民史料，可以为这一看法找到充足的证据。

虽然云南偏居中国西南一隅，但文明开化的时间和程度并不亚于内地，其文化的发展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考古发掘，云南在这方面曾经出现过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化史中足以占有一席之地。云南考古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邻近地区甚至中原的考古文化有着诸多的密切联系，在某些方面受中原文明的影响颇深，这一方面说明了云南的文化并不是孤立发展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云南古代的文化多彩纷呈，是与移民的进入密切相关的。汪宁生指出：“云南和内地在遥远的古代可能就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或以后，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至少分布着两种面貌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它们以及时代更晚的剑川海门口金石并用文化遗存，都明显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到了

公元前2世纪以前,滇池地区曾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它更与内地整个青铜文化有深远的关系。由此可以说明,云南的历史自古以来就不是孤立发展的。”^①云南其他学者也一致认为,至迟从新石器时代起,云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有考古发掘文物作为证据。^②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云南地区存在着百越、百濮和氐羌三大族群。越人和濮人可以被看成是云南的土著居民,而氐羌则是由外地迁入,现今云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大多由从中国西北迁入的氐羌与其他原始居民融合、演化而成。据《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獫狁。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嵩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是中国古籍所记载的羌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这次迁徙是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在此之前,由于经济生活或其它方面的原因,已有少量羌人南迁到四川和云南地区。例如摩沙夷是云南丽江、四川盐源等地的纳西族先民,根据考古材料断定,他们在

① 汪宁生:《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② 参见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林声:《从考古材料看古代云南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联系》,载云南《学术研究》,1961年第6期;李昆声:《论云南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载《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增祺:《从出土文物看我国至西汉时期云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载《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公元前 10 世纪时已迁到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地区。^①

作为这种看法的主要文物证据，就是在摩沙夷分布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考古学界认为，这些石棺墓的族属是古代“白狼”人，而摩沙夷是“白狼”人中的一支，“白狼”人又是属于羌人中的一支。从石棺墓的分布地区和路线分析，摩沙夷是通过澜沧江河谷由北逐渐向南迁徙的。^②而“纳西族有替死者招魂超度然后送魂返乡之俗，并用自己民族的文字东巴文写为《送魂经》。丽江东巴（宗教巫师）替死者送魂返乡，各地返乡路线大体相同，而主要的一段路线是从白沙经大巨（巨甸），然后渡金沙江送往北方。这一路线，多少反映了纳西族历史上的分布和迁徙活动的历程。”^③

除了石棺墓以外，云南新石器时代也出现了一些特殊器物，如林芝出土的细腰型石网坠（就卵石两边打出缺口），是忙怀及澜沧江流域其他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常见的器物。又如卡若遗址陶器上常见的划纹，其风格和云南洱海地区及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基本一样。“以上反映出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和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已存在着某些联系，这种联系应与这片地区历史上一次大的民族迁徙有关。据各种迹象来看，属于后来称为氐羌的族群沿着横断山脉及其河谷地带自北而南的迁徙浪潮，正是在公元前第 2000 年就已开始。”^④

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在公元前第 2000 年氐羌族群已开

① 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82 页。

② 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 85 页。

③ 《纳西族简史》编写组：《纳西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5 页。

④ 汪宁生：《从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关系》，见前揭其《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一书，第 202 页。

始从中国西北地区南迁,但从前面所谈石棺墓葬的测定年代来看,至迟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云南北部地区已有氏羌族群居住。而且从其它考古材料可以证实,在新石器时代,从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到西南的西藏、四川、云南之间,存在着被学术界承认的“民族走廊”。“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氏、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它们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①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考古学界对于氏羌族群从中国西北部迁至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比如上面谈到的石棺墓葬族属问题。到了青铜时代,中国西北地区的草原文化(人们通常称为“斯基泰文化”)对云南地区的影响则进一步加深和明确。据研究认为,斯基泰文化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影响范围,是在洱海和滇池区域以北地区,在云南青铜时代的出土文物中,这种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动物格斗、骑马猎手、杖头铜饰、铜甲、石坠、带柄铜镜、铜柄铁剑及金剑鞘、战斗布局与战士的装饰、牛角杯及饮“同心酒”等。^②带有这些文化因素的器物主要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但也有不少是见于上面所谈的“民族走廊”出土的文物中。例如,杖头铜饰不仅见于晋宁石寨山,也见于德钦县的石底墓葬中;带柄铜镜出土于德钦县永芝和宁蒗县大兴镇的墓地;铜柄铁剑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及四川岷江上游阿坝、犍为、凉山、茂汶、汶川、理县、

①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② 张增祺:《再论云南青铜时代“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及其传播者》,载《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雅江、木里、盐源、西昌及斯基泰文化分布地区^①。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就可以看出，上述文化因素不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其分布地区与“民族走廊”的走向基本一致，所以，有学者认为，将斯基泰文化传入云南的承担者是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白鸟芳郎指出：“这种以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为特征的文物在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在以云南省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出现这一事实，可以这样推测：正是受斯基泰文化影响并发展了这种装饰艺术的南西伯利亚和内外蒙古的牧民们经过新疆、甘肃和陕西，向今天的四川、云南方面南下，带来了他们固有的文化。”“作为乌蛮族的麇蛮和么些蛮本来是牧羊民，从古就移居到云南，侵占到原住民族白蛮族的地区，并带来了游牧民族的文化，他们中也有很多移居到西爨白蛮据处的晋宁，石寨山文化中见到的带有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文物无疑就是他们带来的。”^②白鸟芳郎认为将斯基泰文化因素带到云南的是彝族和纳西族的先民，也即古羌族；但他同时又认为白蛮为云南的原住民的观点是不能令人接受的。现今学者大多认为，白族先民白蛮是从“僰人”而来，而僰人也属于氐羌的一支，而且僰、白二字相通。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僰，羌之别种也。”《史记·主父偃列传》、《汉书·伍被传》等都有“羌僰”的记载，而《盐铁论》和《后汉书·杜笃传》等作“氐僰”，氐、羌二字在中国文献中或分开使用，或合并使用，表明在古代当为同种。但无论如何，云南的氐羌族群是由

① 参见前揭张增祺《再论云南青铜时代“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及其传播者》一文；吴怡：《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载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编写组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

② [日]白鸟芳郎著、朱桂昌译：《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民族研究译丛》，1982年第1期。

中国西北地区迁来，其中自然也包括白族的先民。应当指出的是，白鸟芳郎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74年，在当时已提出斯基泰文化传入云南是由于民族迁徙所致这一观点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创见。

中国学者认为，阿尔泰——帕米尔一带的游牧民族塞人，沿横断山脉河谷进入云南西部地区，带入了斯基泰文化。后来他们又向滇北、滇地区域、滇东北地区移动，同时也将斯基泰文化带入这些地区。这些“塞人”，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僇人”，《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的“塞夷”。僇人又称叟人，是近代彝族的一部分。^① 无论是哪个古代民族将斯基泰文化传入云南地区，“云南青铜时代有斯基泰文化因素（当然只是一小部分），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那么斯基泰文化通过什么途径由欧亚草原传入云南，我认为这是由于民族迁徙所致。也就是说，古代确有过部分斯基泰民族进入中国西南边疆，随之亦带来欧亚草原文化。”^②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时期，氏羌族群的一部分从中国西北逐渐迁往中国西南的西藏、四川、云南等地，对此中国最早的编年史料已有记载，而在考古文物方面可以为这一观点找到更为充足的证据。李昆声先生总结指出：“从各方面材料看，自先秦以来，均有羌人从我国西北往西南迁徙的事实。而这种迁徙活动，是循着他们的新石器时代的先人的足迹前进的。迁徙的路线是沿横断山脉的几条大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河谷通道移动的，这一情况在滇西北、滇西德钦永芝、纳古、剑川沙溪等地青铜时代墓葬中反映得比较清晰。云南有的器

① 见前揭张增祺《再论云南青铜时代“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及其传播者》一文。

② 同上。

型，是在西北地区衰落或消失后才出现的。如尖底瓶，是在仰韶文化消失后才出现的（传播媒介可能是甘肃仰韶文化）。西北地区约当夏代的齐家文化，在云南东周青铜时代墓葬中看出了它的强烈影响，如德钦永芝的双耳陶罐、纳古的青铜小刀、剑川沙溪的单耳、双耳、三耳陶罐和‘安弗拉式’双耳罐，而与齐家文化年代相近的宾川白羊村新石器遗址却远不如东周墓葬受齐家文化影响那么强烈。换句话说，氏羌文化对云南的影响，从新石器时代起，往后越来越强烈。云南西部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少数民族（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拉祜、藏、景颇、怒、独龙、阿昌、普米等族），其族源大都与古代氏羌有关。”^①

由于氏羌族群源源不断地从北向南迁徙，到了中国出现官修正史的时候，氏羌族群已广泛分布于四川南部及云南北部地区。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牁，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牂牁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从这条最早的官方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到了秦汉时期，居住在贵州、四川、云南等地的靡莫、昆明等氏类原始民族，依然过着“随畜迁徙”的生活，他们从中国西北迁入到中国西南地区，是出于征战等方面的原因；而在西南地区范围内的流动，则主要出于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即经济方面的目的，所谓“随畜迁徙”就是最好的明证。在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前，换句话说，在中央封建政府将

① 李昆声：《论云南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载《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云南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前，官方政治方面的移民浪潮尚未正式开始，自然的移民，或即我们所说的为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的移民就成为秦汉时期以前云南移民的主要形式。在这种移民态势中，自然、地理、气候、生存条件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也决定了移民的方向，氏羌族群的南迁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除了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以外，云南氏羌族群后裔即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的种种传说，也可以作为历史上其先民曾经从中国西北迁入云南地区的佐证。这种种传说或史诗或神话虽不能被视为信史，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上这些民族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从而为他们的先民从北向南的迁徙过程和路线提供某些方面的旁证，虽然这种旁证不是十分的确凿和可靠，但至少是提供了大体的民族来源和迁徙方向。否则，也许我们可以武断的问一句：在这些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的传说或史诗中，为什么没有他们的祖先源于云南或西南地区，从南向北迁徙的提法呢？

纳西族的丧葬习俗及其他送魂返回北方的做法，前面已有所述。再看彝族，在其经典记载和传说中，大都认为彝族的祖先原住在“世界的北方”，甚至还有原住在西北高原某处的说法。彝族巫师为死者送魂的路线，也大多指向北方。哈尼族和彝族自古以来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今红河南岸的哈尼族中还普遍流传着“哈尼族、彝族是一母所生的儿女”的说法。据哀牢山区哈尼族传说，其祖先最早居住在“虎尼虎那高山”，后来迁到北方一条江边的“诺马阿美”平原，再辗转南迁，中途曾在一个名叫“谷哈”的地方停留，然后又分路南下至滇南各地。对“谷哈”有两种解释：红河、元阳一带哈尼族的传说，“谷哈”即今滇池昆明，其祖先是经今昆明南下来的；新平哀牢山的哈尼族，则相传“谷哈”系指洱海大理，其祖先是从小大理南下而来。^①根据哈尼族的族称和其由

① 见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北向南迁徙的路线来分析，“虎虎那尼高山”可能是青藏高原，公元前3世纪，哈尼族的祖先“和夷”所居的今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所源出的连三海周围，或大渡河与金沙江交汇的地区，可能是哈尼族传说中的“诺马阿美”平原。

而景颇族祖先起源的传说则更明确地指出他们是来自青藏高原。景颇族的传说认为，其祖先发源于“木转省腊崩”，景颇语意为“天然平顶山”，据说是一个终年积雪、非常寒冷的地方，位于迈立开江、恩梅开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之源以北的地方，即青藏高原。云南省陇川县的景颇族对其发源地的追述更为详细。其传说认为，景颇族最初的发源地是“蒙哥利亚”，即今甘肃一带，后迁到靠近青海的“木转省腊”，接着又迁到昆仑山一带，再迁到“木转省腊崩”（据说是喜马拉雅山脚）。以后又分成两股向南迁徙，最后落脚到缅北密支那和中国云南德宏地区。在景颇族一年一度的“木脑纵戈”节日盛会上，他们的第一首歌这样唱道：

青藏高原是景颇族发源的地方，
那里有九条江分出九座山，
流淌着波涛翻滚的伊洛瓦底江，
奔腾在峡谷中的怒江，
还有的乃、都翁江……
这就是产生景颇族的地方。^①

景颇族传说中经常提到的青藏高原，正是古代氐羌部落的活动区域。至于南迁的原因，据景颇族传说是由于“木转省腊崩”是个非常寒冷的高原，终年积雪，南迁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地方。^②结合有关的历史记载来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的征战也是导致氐羌部落南迁的一个原因。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无弋爰剑之后

① 参见《陇川县志资料》，1985年第1期，第107页。

② 《景颇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山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成为武都、广汉、越嶲诸羌，属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秦至两汉时期，氐羌部落进一步大量迁入西南地区，形成嵩、昆明等氐羌部落群。

这些陆续南迁的氐羌部落中无疑包括景颇族的先民在内。直至解放前，景颇族老人死后，要请“董萨”把死者的灵魂送归本民族的发源地，送魂路线即沿恩梅开江东岸北达康藏高原，这实际上也是其先民南迁的路线。其中景颇支送魂路线从伊洛瓦底江之西追始于“木转省腊崩”；浪峨（浪速）支的送魂路线则经保山、腾冲、泸水县的登埂、六库、老窝、云龙县的漕河、瓦窑，并跨过龙川江、怒江和澜沧江直至金沙江边。由此可见，景颇族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景颇支）可能自康藏高原分支后，从德钦南下，沿澜沧江以西、怒江及伊洛瓦底江源头南下，并进入江心坡及其西部地区；另一部分景颇族（主要是浪峨、喇期、载瓦等支）则南迁至澜沧江以东，金沙江及泸水的大片地区内。以后澜沧江以东的这部分景颇族先民又逐渐西迁，越过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进入滇西缅北交界地区，与西部的氐羌部落汇合，并相互融合，形成今天的景颇（克钦）族的各个支系。后来，江心坡一带的景颇（克钦）族又向外流徙，一部分向南迁入今德宏州地区，一部分向西迁到今缅甸孙布拉蚌、胡康河谷、德育茜和南北掸邦一带，形成了现在我国景颇族和缅甸克钦族的分布格局。^①

在云南其他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的传说或史诗中，也大多有其祖先源于北方的说法。这些传说虽不能作为信史，但结合前面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从中大致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云南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不是土著，其先民是从它地迁入的，并经发展、演化，与其他原始民族融合，形成今天的藏缅语族各民族。

① 参见前揭《景颇族简史》一书，第22—23页。

族。第二，虽然由于诸多原因，关于云南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发源地无法具体确定，但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是位于中国西北的青藏高原，或更进一步的地方即甘肃、青海等地。大约从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开始，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先民即氐羌部落从北向南迁徙，到春秋战国时期，氐羌族群已广泛分布于四川南部和云南中北部地区，云南出土的石棺墓葬和有关文物以及晋宁石寨山文物上的斯基泰文化因素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受氐羌部落迁入云南的影响，云南境内的土著居民百越和百濮族群也不断向南移动。例如百濮族群，后来演化成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孟高棉也即孟吉蔑，今天云南的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和克木人皆属于其后裔。陈序经指出：“约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自中华民族逐渐从北方而移到南方的时候，在中国南方一带的民族，也开始向南迁移，这样，又影响于原来住在越南半岛（即中南半岛——引者）北部的民族，他们也逐渐南移。”^①其中有一部分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就从云南移入邻近东南亚国家，因为他们“最初所居住的地方应该是在中国的西南，而靠近中越与老挝的交界的地方。”^②岑仲勉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若扶南（柬埔寨古国——引者）之吉蔑（即高棉——引者），我则相信原自云南移去。”^③另外，云南地区的越人在历史上也曾南迁至中南半岛，并主要形成了今天的老、泰、掸等民族。

秦朝统一中国之前，由内地往云南较大的移民是庄蹻王滇。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

① 陈序经：《扶南史初探》，第 65 页。

② 同上。

③ 岑仲勉：《据〈史记〉看出緬、吉蔑（柬埔寨）、昆仑（克伦）、暹罗等族由云南迁去》，《东南亚历史论丛》，第二集，1979 年。